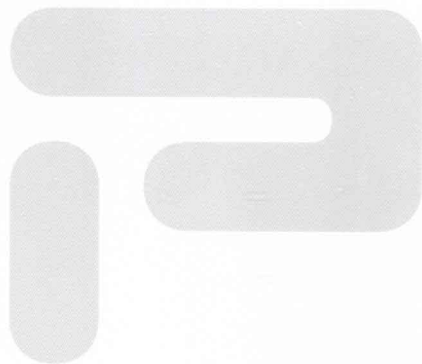


万卷方法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范式与沙堡：

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

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 著

陈子恪 刘 骥等 译

张睿壮 刘 骥 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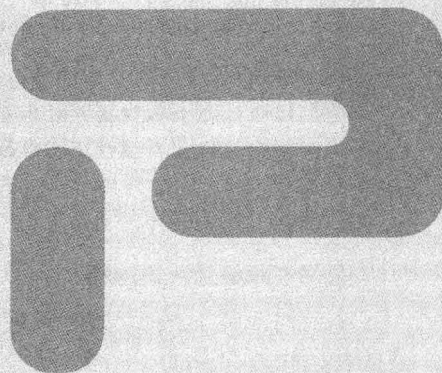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万卷方法

政治学与行政学研究方法译丛
主编 张睿壮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范式与沙堡：

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

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 著

陈子恪 刘 骥等 译

张睿壮 刘 骥 校

重庆大学出版社

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Barbara Geddes.
ISBN 978-0-472-06835-7

Copyright ©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2003

All rights reserved

Published in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by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No part of this publication may be reproduced, stored in a retrieval system, or transmitted in any form or by any means, electronic, mechanical, or otherwise,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publisher.

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作者:芭芭拉·格迪斯。原书英文版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出版。原书版权属密歇根大学出版社。

本书简体中文版专有版权由密歇根大学出版社授予重庆大学出版社,未经出版者书面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复制。

版贸核渝字(2009)第074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

(美)格迪斯(Geddes, B.)著;陈子恪等译. —重

庆: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1. 11

(万卷方法)

书名原文:Paradigms and Sand Castles: Theory

Building and Research Design in Comparative Politics

ISBN 978-7-5624-6375-7

I. ①范… II. ①格… ②陈… III. ①比较政
治学—研究 IV. ①D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205507 号

范式与沙堡:比较政治学中的理论建构与研究设计

芭芭拉·格迪斯 著

陈子恪 刘 骥 等 译

张睿壮 刘 骥 校

责任编辑:林佳木 版式设计:林佳木

责任校对:刘 真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邓晓益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虎溪大学城重庆大学(虎溪校区)

邮编:401331

电话:(023)88617183 88617185(中小学)

传真:(023)88617186 88617166

网址: <http://www.cqup.com.cn>

邮箱: fxk@cqup.com.cn(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787×1092 1/16 印张:14.75 字数:330千

2012年1月第1版 2012年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ISBN 978-7-5624-6375-7 定价:34.00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作译者简介

作者简介：

芭芭拉·格迪斯(Barbara Geddes), 洛杉矶加州(UCLA)政治学教授, 曾任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研究员。

格迪斯是比较政治领域中被人广泛引用的案例选择方面的权威。她的这本《范式与沙堡》论证了 in 支持理论的过程中构思精致的研究设计与收集令人信服的证据二者之间的关系, 并通过一些从比较发展研究领域精选出来的有趣实例向读者传授研究技艺。对于从事比较研究的学生和学者而言, 本书可谓是一本极佳的指南。

校译者简介

张睿壮, 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政治学博士, 主修国际关系和政治学方法论。南开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博导, 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美国研究中心主任。中国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 中华美国学会常务理事, 中国政治学会理事; 清华大学《国际政治科学》学术委员会成员暨 *The Chinese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牛津大学出版社) 杂志编辑委员会成员; 曾任北京大学、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美国多米尼肯大学、韩国天主教大学客座教授以及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问题高级研究院访问学者。主要研究与教学领域有: 国际关系理论与当代国际关系、美国外交政策与中美关系、社会科学方法论等。

刘骥, 四川安岳人, 北京大学学士、硕士、博士, 专攻比较政治学与比较政治经济学, 南开大学阿红译社高级合伙人, 天津荒岛书店学术与艺术顾问, 南开大学政治学系教师。兴之所至, 随心所欲, 超凡脱俗, 特立独行。

陈子恪, 山东新泰人, 南开大学学士, 阿红译社第二任社长。学为真知, 淡泊浮云。

© 2006 The Authors
Journal compilation © 2006 Blackwell Publishing Ltd

我国科学方法论的落后,以社会科学为甚,而社会科学中又以政治学为尤。中国的政治学研究在方法方面表现出以下几方面的缺陷。

规范性研究主要建立在价值判断基础上,往往会出现见仁见智、莫衷一是的局面。其实在人文社会领域有许多重大问题和争论,看似扑朔迷离、错综复杂,说到底就是一个价值排序的问题。匈牙利人裴多菲有一首脍炙人口的诗:“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一切皆可抛。”这就是典型的价值排序。即以正义战争论与非暴力论的辩论为例,一方认为为了某种崇高的目的甚至可以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不自由毋宁死;另一方则认为生命至高无上,没有什么能使暴力正当化。双方分歧的焦点不是一个真伪是非的问题,而是不同的价值偏好;它不是一个科学问

题,而是一个信仰问题。这样的问题哪怕争论一万年也不会有定论,所以现代社会科学要把这样的问题排除在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外。

思辩性研究以先验的箴言式知识为前提通过逻辑推理进行演绎,各种学说也是“你认为”“我认为”的主观见解,没有统一的检验标准。问题在于,按照“常理”推论,其逻辑路径往往不止一条,如果没有实证检验而单从演绎逻辑判断是分不出真伪高下的。例如,一支球队屡战屡败,到了球季最后一战前预测战况,有人说“哀兵必胜”“背水一战”;也有人说“士气崩溃”“兵败如山倒”,双方都有道理,都是“人之常情”,不到最后战局揭晓是分不出胜负的。

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方法就是针对这些方法的弱点而发展出来的,采用类似自然科学的研究方式,强调以经验证据为理论的唯一检验尺度,这样就有了一个共同的客观标准,有利于问题的探讨,为去伪存真、知识积累提供了可能。一个真实的案例是二战期间美国行为主义政治学的先驱为美国军队所做的一个调查。当时为了提高军人士气,需要知道什么样的军人有较大的“思想问题”,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思想工作”。按照“常理”所做的想当然的推理是:教育程度较高的军人比教育程度较低的军人对于被征入伍会有更多抱怨,因为他们原先的社会地位和生活条件都比后者优越。但实际上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却表明,情况正好相反。原来后者多数在与军工有关的生产第一线工作,同伴中被征入伍的为数不多,因此自己被征召就只好自认晦气。前者的情况恰恰相反,同伴大多被征召入伍,大家彼此彼此,也就没有多大怨气了。两种解释都很合乎逻辑,都很有道理,但只有被实证的经验证据支持的才是最有力的结论。

其次,缺乏对概念定义的明确化和操作化。这是科学方法一个很重要的内容。为了避免概念混乱,必须对研究中使用的概念进行精确定义。同时,为避免概念的空泛并满足科学理论可以证伪的要求,还必须将概念操作化为可观察的具体指标。只有这样,从理论中推出的假设才有可能接受检验。科学理论的标志是能证伪,证伪的必要条件是概念的明确化和可操作化。我国的政治学文献中,很多概念既大且玄,抽象而又空洞,用这种概念构建的理论是没有办法证伪的,也是无法批判的,因此不能算作科学理论。

复次,缺乏逻辑思维,尤其是因果逻辑的严密性。形式逻辑和因果逻辑在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都是空白,对此爱因斯坦和荣格都曾有所论及。著名的“李约瑟之谜”问道:为什么近代科学和工业文明诞生在西欧,而不是在当时(17世纪)经济和技术最为发达的中国?我们中国人自己也应该扪心自问,为什么灿烂辉煌的中华文明在最近五百年的科学技术发展史上交了白卷,只要一提及发明创造就还得回到古代的四大发明?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社会的、文化的、思维方式的。而其中最主要的,就是思维方式不够缜密以及在学问上唯有断言,不求证明。遗憾并且值得警醒的是,自从20世纪初大力引进“赛先生”的现代化运动以来,这些传统思维方式中的缺陷并未受到多少触动,对它们的反省、批评和纠正远未展开,而且往往刚一露头,就会遭到所谓“国粹派”(其实是自毁派)的口诛笔伐。其结果,我们的人文社会学术界在思想缜密性上还一直享受着随心所欲、无以规矩的“混沌之美”,而不必顾忌任何规则的束缚。例如,根据因果推理的法则,即便是相关关系的建立都必须经过排伪详析,而对因果结论(causal statement)的要求就更高了,必须满足一定的条

件(因果机制)才能得出。而在我国政治学文献中,轻易、随意地下因果结论的做法比比皆是,大家完全没有因果推理必须严密意识。这是我们的研究仍远离科学的又一例证。

最后,研究问题宏观有余而微观不足,只有战略没有战术。我国政治学学者的思维方式多数还是宏观思维,研究的问题太宏观、太宽泛而缺乏具体内容,例如时代主题、历史潮流、战略格局、发展趋势,等等。在国外,许多研究做的是具体而微的课题,切口很小,但有深度,把一个问题或一个局部搞深搞透,然后见微知著,推而广之。这样得到的普遍结论就有坚实的根据,而且对一些微观问题的细节了如指掌,不但对宏观战略而且对具体政策的制定都有极大的参考价值。这个问题的根源,其实就是胡适先生早在一个世纪前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中批评过的“避难就易”的懒汉思想。宏大叙事往往使用无法操作的模糊概念,从概念到概念,因而无法证伪。如是,论者可以信口开河、高谈阔论而不必担心被检验、被证伪。这种模棱两可、真伪莫辨的宏大命题,既无法指导实践,亦不能增进知识,只能是百无一用的空谈。

近十余年来,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急剧增加,特别是海外留学学者的回归和短期讲学活动的开展,对我国政治学领域实证科学研究方法的推广普及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一些高校开始开设社会科学/政治学方法论方面的课程和/或寒暑期短训班,尽管学校之间的师资、课程内容和教学质量参差不齐,有的甚至与真正的实证研究方法相去甚远,但毕竟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另一方面,有关实证科学方法的专著和译作也不断问世。这说明在我国学界已经有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了中国学术发展的瓶颈之一在于研究方法的改进,并且正在为之努力。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重庆大学出版社的几位青年编辑,看准了这一亟待开发的学术前沿,在最近几年里呕心沥血、精心策划,组织翻译出版了大型系列丛书“万卷方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万卷方法”的选题,最初是偏重社会科学方法一般,前两年编辑部派人找我,希望由我主编以译作为主的“万卷方法政治学与行政学”系列,这样的事业我当然支持,故双方一拍即合,随即开展合作。

作为主编,我的主要任务是选书、选人和严把质量关。在选书方面,我们的标准分为三个层次:一是入门的初级读物,如大学本科教科书;二是对一些常用方法(如比较案例研究方法)的深入讨论,包括其长处、短处和多发谬误的防范,等等;三是在科学哲学层面上进行的方法论探索,属于层次比较高级的读物。当然,在实际运作中,对原著的选择并非总能如愿以偿:有的已经被别的出版社捷足先得,有的在购买中文版权上难以达成协议等。所以总有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在选人方面,我们的译者多为高校青年教师骨干、名校毕业的政治学博士。但职位和学历并非选择他们的原因,他们的学术水准和文字能力才是关键。如所周知,最近一二十年来中国学界处于严重失范中,在学术出版方面,急功近利、粗制滥造的学术垃圾比比皆是,这种恶劣的学风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学者,特别是青年学者的心态,对他们的工作态度起了令人痛惜的腐蚀作用。我们在翻译工作中坚持逆流而上,坚持“信、达、雅”的高标准、严要求,绝不与马虎草率的不正之风妥协。在我们的内部审稿中,译稿质量达不到标准的即以退稿处理,经修改仍不能达标者不再留任翻译团队。我们在时间精力上的投入,与这些纯学术著作的市场价格远不成比例,我们是把这个项目当

成学术上的奉献来做的。我们要求自己的工作成果能够对得起读者,也对得起原作者。由于工作量大和合格译者少的缘故,这些译作中肯定还存在不少问题和谬误,希望广大读者特别是有关方面的专家不吝指正,但我们至少可以问心无愧地说,我们尽力了。

张睿壮

2011年10月7日

于南开大学西南村

译者序

其实,这本书是不需要译者序的。

一般来说,译者写序,都是出于三个目的:怕读者不懂、怕上级误会、怕洋人还不够高。《范式与沙堡》在“三怕”的理由上都不需要译者担忧,所以也就大可免了这种性质的序言。

第一,怕读者不懂。用香港大学陈慧荣博士的话说,这本书太可爱了,从来都没有见过这么“平易近人”的方法论书!难怪他当年去港大念博,首选就是这本。

各位看官翻翻这本书的目录,就知道它作为研究生的方法论首选读物当之无愧。各章标题依次是“你选择的‘问题’‘案例’‘证据’‘路径’如何影响你的答案”。格迪斯抛弃了方法论读物常见的扯虎皮做大旗的大调调,一上来就是一副“手把手”教你做研究的低姿态。最难能可贵的是,她也不回避方法论上艰深的哲学难题,转而用具体的经典研究来向读者展示这些难题在实践中的层次与限度。只要你是真的想做研究,也真的在方法上遇到过困惑,那么,格迪斯对几个方法论难题的阐述与讲解,你不懂都难。

第二,怕上级误会。这本书通篇都在讲比较政治学,虽然偶尔提及中国台湾地区、劳工压制促进经济发展、民主化等议题,但也是完全当成纯学术性的批评靶子,并无任何偏向性的意识形态主张。另一方面,格迪斯自己偏向理性选择方法,也是有选择、有保留地向读者兜售,并没有贬低官方主流理论流派的歧视性评论。如此种种,上级如想误会的话,还真得动点脑筋,所以,出版社大可放心印刷,让广大学子得点西学实惠。

第三,怕洋人还不够高。台湾大学的石之瑜教授在给南开大学的张睿壮教授台版文集写序时,提到这么一句话,很有意思:“华人知识界普遍存在覆颂洋学问,吹捧洋老师,甘为洋文献提供似是而非的证据,或装模作样自诩特色,一同来表演中国如何与众不同。”的确,很多介绍西方理论到中国的译者,往往因为自己个人受训练时的口味偏爱或是国人自鸦片战争以来根深蒂固的自卑感,而一味吹捧洋老师、压低本国学术。这种事,我也干过,现在想来实在惭愧。为什么颇有反骨的年青人很容易就犯这种心向外洋的大错误呢?我想,是因为在另外一个极端的本国鸵鸟们实在太让人无语了——理论方法也不学,外文文献都不看,实证规范分不清,策论折子当科学,还老说要创建有中国特色的“××学理论”。

两种极端都不可取,年青人还得踏踏实实做学问,西方理论要学,中国问题要懂。如何综合,如何建设,作为晚辈,我不知道该做些什么——我现在只知道什么是不能做的。洋人到底有多高,中国的学术能否崛起,恐怕还得一代又一代的学人,长期不懈地探索。

话说回来,格迪斯自己老老实实给研究生上讨论课(seminar),勤勤恳恳把上课的焦点专题总结出来,她不是什么大师,不需要我来吹捧。她只是一名“教师”,一名值得我们尊敬的真正的教师。中国大学里缺的就是这样愿意好好上课认真写书的教师。

在第1章第1页,正文之前,格迪斯就引了一首雪莱的诗《奥西曼德斯》(*Ozymandias*)。雪莱用石碑上法老的话和现今的废墟来比照:一方面是石碑上法老傲慢与自大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几乎快要被岁月消磨殆尽的废墟。这个强烈的对比,讽刺的是法老的愚蠢。格迪斯借用这个典故,讽刺的是理论家们雄心勃勃地建立起来的理论,最后都像是奥西曼德斯的功业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化为尘土。

我们翻译雪莱的诗时,选来选去,还是觉得穆旦(查良铮)的译本最好。穆旦是老一辈的南开人,诗人、翻译家。我们不是诗人,却也在南开做翻译。然而,我们翻的不是浪漫的人文,而是严谨的社科。面对中国社科学界这种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状态,我们应该科学科学再科学。我们更不应该动情。

可是,每个深夜,我在穆旦待过的南开园里,自己的小台灯前,翻起译稿,读到他的译诗,看着阿红译社诸君这一年以来堆起来的密密麻麻的小字,总有些情绪,在心头荡漾开来——做个项目捞点稀饭钱不算什么,译本洋人的书又能算什么呢?或许,只有甘心做好过渡的一代,把南开君子严谨求真的学术香火传下去,给兴许会浮现出来的下一代学术大师当好垫脚石,最后勉强能算积点功德。所以,译社也好,书店也罢,其目的都不在做书,而只为育人。这人,育得怎么样?天晓得。好在过程似乎还不算无聊,孩子们既调皮又懂事,让我有得玩、有得教。

截稿之际,为避免眼睛里出水,我嘴巴上就嚷嚷这么几句,勉为序言。不为读者、上级、洋人的“三怕”,而只是抒发一些人之为人的正常情怀,还望读者见谅,编辑抬手。

“在这巨大的废墟四周,无边无际,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刘骥

2011年5月30日

于南开大学荒岛书店

致 谢

我在撰写本书的第一部分时正跟我的小女儿在一起,那时她得了幼儿疝气,不停地在后院哭闹。她现在已经十三岁了。我首先想要感谢她,因为她已经渐渐长大,成了一个既古灵精怪又讨人喜欢的孩子,这终于能使我或多或少重新过上文明的生活。

在这项耗时如此之久的研究项目中,我欠下的人情债不可胜记。过去的这些年间,加大洛杉矶分校(UCLA)的许多研究生(其中一个现在已经获得了终身教职)都曾在该项目的不同领域中帮助过我。在此我想感谢下列人士所提供的帮助与专业知识:阿利森·本顿(Allyson Benton)、汉纳·博涅(Hanna Birnir)、金伯利·奈尔斯(Kimberly Niles)、约翰·奎因(John Quinn)、塔蒂阿娜·里佐瓦(Tatiana Rizova)和卡西·斯威特(Cathy Sweet)。我要特别感谢谢丽尔·舍恩哈特-贝利(Cheryl Schonhardt-Bailey),如果不是她坚持在图书馆查阅资料,我根本不可能在女儿得疝气的那个夏天写出本书的第一部分;我还要特别感谢爱德华多·阿莱曼(Eduardo Alemán)、利兹·斯坦(Liz Stein)和马里萨·克拉姆(Marisa Kellam),他们聪明、负责、性格和善,正是他们在本书写作的最后阶段所做出的努力使全书的面貌大为改观。

在开始写这本书之前,我一直在用书中的观点教授研究生的研究设计课程。书中很多观点都是在回应学生们的研究项目时想到的。书中所举的例子最初是用来给学生们讲授抽象概念的,正是在回应学生们的问题和困惑的过程中,这些例子不断得到完善。我要感谢我的学生们,感谢他们深思熟虑的问题以及对课程的热情回应。许多年以来,这一直是最我愿意教的一门课。

同事们的评论也令我获益良多,我已记不清有多少位同事曾对本书作过评论,这当中既有私下的讨论,也有研讨会上的公开点评。我尤其想感谢以下人士:大卫·莱廷(David Laitin),他就本书的大部分手稿给出了富有挑战性和非常有益的评论;大卫·科利尔(David Collier),他对选择偏差一章的早期版本提出了批判;鲍勃·杰克曼(Bob Jackman),他与我讨论了如何检验利普赛特与罗坎的论点,并对整个研究项目给予了鼓励;埃伦·卢斯特-奥卡尔(Ellen Lust-Okar),她与我分享了有关中东的专门知识【ix】。加大圣迭戈分校(UC San Diego)、新墨西哥大学(University of New Mexico)和耶鲁大学(Yale)举行的研讨会尤其令人兴味盎然,这几次研讨会在我的心目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在此我想感谢这几次研讨会的组织者——迈尔斯·卡勒(Miles Kahler)、卡伦·雷默(Karen Remmer)和伊凡·泽兰尼(Ivan Szelenyi)。

UCLA 的斯科特·沃(Scott Waugh)院长为本项目提供了大部分的资助,在此感谢他对本项目的支持,同时我还想感谢他对提高 UCLA 的学术生活质量所做的许多

其他贡献。

最后,我想感谢我最大的粉丝——约翰·佐莱尔(John Zaller),他阅读了本书的全部手稿,并毫不留情地攻击其中存在的逻辑与组织问题,同时他还对本项目保持着一份非凡的热情。感谢他与我分享并增强了我对“以学术为志业”(science as a vocation)这一信条的归属感(commitment),正是这种归属感促使我完成了本书。此外,我还想感谢他在与我分享生活的其他方面时所显露出的那份乐观、和善和活力。【x】

1	研究设计与知识积累	1
	范式的兴衰:一个例子	4
	理论与范式脆弱性的原因	12
	这一领域不确定的未来	14
	本书计划	16
2	大问题,小答案:你选择的问题如何影响你的答案	19
	“以学术为志业”,而不只是一份工作:选择一个研究主题	19
	浪漫的问题,可靠的答案	25
	把大问题分解为多重过程的例子	27
	结 论	57
3	你选择的案例如何影响你的答案:选择偏差及其相关问题	58
	问题的本质	59
	根据因变量选择案例:一个简明的例子	60
	复杂历史论点中根据因变量所做的选择	69
	时间序列、案例研究与选择偏差	76
	案例研究、时间序列与趋均数回归	81
	结 论	85
4	你使用的证据如何影响你的答案:严格使用案例研究中包含的证据	86
	案例研究证据的角色及其恰当使用	87
	非定量的操作化与衡量	94
	来自利普赛特与罗坎的一个例子	97
	结 论	114
5	你选择的路径如何影响你的答案:理性选择及其在比较政治学中的应用	116
	理性选择区别于其他方法的特征	117

理性选择的应用	126
理性选择与比较政治学的前沿	135

6 结 论	139
-------------	-----

附录 A	146
------------	-----

附录 B	153
------------	-----

附录 C	163
------------	-----

参考文献	199
------------	-----

索 引	209
-----------	-----

译者后记	216
------------	-----

研究设计与知识积累

1

“我是奥西曼德斯，众王之王。
强悍者呵，谁能和我的业绩相比！”
这就是一切了，再也没有其他。
在这巨大的荒墟四周，无边无际，
只见一片荒凉而寂寥的平沙。

——帕西·比希·雪莱，“奥西曼德斯”^①

刚刚过去的这三十年，对于发展中国家政治的研究者来说很不友好，这几乎就跟岁月对奥西曼德斯的消磨一样^②。正当走向威权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冲动已经“得到了各种日益趋同的分析路径（approaches）的充分解释，并因而以其庄严的必然性甚或永恒性得到了充分理解之时”（Hirschman 1979，98），民主化开始席卷世界上许多地方。在另一轮更令人意想不到的变化中，每一个区域的政府都开始放弃国家干预主义的经济政策，转而支持更偏向市场导向的政策。更为重要的是，苏联帝国崩溃了。虽然学者们已然以一种愉悦的态度来对待大多数这些事件，但是，几乎没有人预料到这些事件会发生，因为在这些变化开始之时占据支配地位的理论，并没有对这些事件做出预测（参见 Remmer 1995，103；Kalyvas 1999）^③。

面对世界上诸多令人瞩目的事件，学者们很快把他们的注意力转向试图理解这些事件。作为这些调查的一个最初成果，他们认识到，在那些比较发展的研究者所珍视的理论中，几乎没有哪一种理论为解释最近的事件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针对“从威权主义的转型”的研究中，旧理论有限的有效性早就被注意到了（有时是那些先前的研究者自己注意到的）。不管是在对 1960 和 1970 年代期间威权主义迅猛发展的解释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受依附论影响的观点（dependency-influenced arguments）（例如，O'Donnell 1973；Cardoso 1973a），还是对民主化的历史性解释（例如，Moore

① 查良铮译：《雪莱抒情诗选》，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 年重印第 1 版，第 37 页。——译者注

② 《奥西曼德斯》（*Ozymandias*）是雪莱的一首诗，他用石碑上法老的话和现今的废墟来比照：一方面是石碑上法老傲慢与自大的话语，另一方面是几乎快要被岁月消磨殆尽的废墟，雪莱用这个强烈的对比来讽刺法老的愚蠢。格迪斯在此处借用这个典故来讽刺理论家们雄心勃勃地建立起来的理论，最后都像是奥西曼德斯的功业一样随着时间流逝化为尘土。——译者注

③ 很多学者已经分析过最终在这样那样的威权主义中导致转型的脆弱性和矛盾。例如，参见 O'Donnell（1978，1979）对在“官僚—威权主义”（bureaucratic-authoritarian）政权内部联盟伙伴之间的、具有潜在削弱性的紧张状态的分析，以及参见 Kalyvas（1999）对有关共产主义政权的虚弱与无能的大量分析的总结。然而，在我看来，没有人预料（expect）或是预测（predict）到我们目睹的席卷大部分发展中世界的民主化与经济改革。

1966),似乎都没有为解释民主制与威权主义之间的突然转变提供太多的帮助^②。吉列尔莫·奥唐奈(Guillermo O'Donnell)和菲利普·施米特(Philippe Schmitter)就强有力地指出了标准的利益集团分析路径或是以阶级为基础的分析路径的不足。

在这些转型期间……要事先(*ex ante*)确切说明哪些阶级、部门、机构以及其他团体将会扮演什么角色,选择哪些议题,或是支持什么替代选择,几乎是不可能的……对于[这些]选择和过程而言,那些有关社会、经济和制度参数的相对稳定性和可预见性的假定显然不妥,因而有关这些参数的描述力和解释力的假定也是不妥当的。(O'Donnell and Schmitter 1986, 4-5)

克里斯托弗·克拉彭(Christopher Clapham)和乔治·菲利普(George Philip)也强调政权转型明显的不确定性:“军政权(military regime)更迭的模式相当像穿过丛林的小径:有许多不同的足迹,而且所有的小径都非常难走……,而且无论如何,大部分小径都不会通向你想去的地方”(Clapham and Philip 1985, 24)。当我们缺乏理论来解释过程的时候,过程就会显得既复杂又难以预测。

论述市场化的文献面临类似的困难。经验研究发现,用以解释经济政策的主要原因——利益集团的影响——几乎不能解释与经济自由化相关的政策变化(例如,参见 Haggard 1990; Haggard and Kaufman 1992, 1995; Bates and Krueger 1993)。然而还没有人已经发现或是构想出一种比利益集团理论更好的理论路径。结果就是,对经济自由化的分析,就像是那些对民主化的分析一样,多年以来还主要是在描述^③。

相比之下,苏联帝国的研究者发现解释其崩溃更为容易。他们的问题不是对崩溃的预测太少,而是太多。至少自 1950 年代以来,很多对共产主义政权的分析就强调其内在的功能失调和矛盾。当这些政权最终垮台的时候,这些功能失调就被援引为原因。然而,这些政治体系却已经在东欧持续了四十年,在苏联持续了七十年^④。转型文献的一个怪异之处就在于,对于长期存在的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大部分早期的分析,都强调它们的矛盾与脆弱,而几乎没有多少对军政权崩溃的讨论——它们持续的时间平均约九年——聚焦于政权脆弱性的内在根源^⑤。

那些长期贯穿于发展中国家研究的文化理论、社会结构理论与经济理论,似乎对解释当代的事件几乎没有提供什么帮助,既然如此,学者们便转向对政治的研究来寻求答案。但是,我们的理论橱柜几乎是空的。由于我们过去未能成功地对发展中国家政治过程的内在运行方式进行理论化,一旦需要建立用政治原因来解释政治结果的理论时,大部分的分析者就会发现他们处在一个全然未知的领域之中。其结

② 鲁斯切梅耶、斯蒂芬斯和斯蒂芬斯(Rueschemeyer, Stephens, and Stephens 1992)不同意这种在其他情况下已被广泛接受的结论。他们试图通过对由摩尔(Moore)开创的传统做出一系列实质性修正,以及纳入额外的变量和偶发事件(contingencies),来使这一传统苟延残喘。

③ 对经济学家而言,他们的迷惑就在于为什么自由化耗费的时间如此之长,他们已经提出了很多对利益集团理论的微调来解释被延迟的改革。例如,参见 Alesina and Drazen (1991)、Fernández and Rodrik (1991)和 Rodrik (1994)。然而,在提出新的理论或是对旧理论进行系统性修正时,政治学家面临的困难更多,对他们而言,经济改革的政治障碍似乎显而易见,而改革的启动似乎更令人迷惑。

④ 格迪斯此处的批评焦点在于,不能用一个不变的东西去解释变化的东西,即苏联和东欧政权的脆弱性这样一个几十年都没有发生变化的因素,不能被用来解释苏东政权垮台这样一个变化的现象。——译者注

⑤ O'Donnell (1978, 1979)是最为有名的例外。

果就是,我们会在早期论述民主化的文献中,发现对偶然事件和唯意志论(voluntarism)的强调(例如,O'Donnell, Schmitter, and Whitehead 1986; Diamond, Linz, and Lipsett 1989)。

有一些学者试图解释不同国家对1980和1990年代国际经济危机的反应,与那些研究民主化的学者相比,他们发现传统理论有更多用武之处,但是,对经济自由化的早期分析仍面临着缺乏理论指导的问题。如同来自国内经济利益的压力一样,国际因素(主要是来自于国际金融机构的压力)继续受到关注。然而,国家的危机状况与决策者个人的特殊信仰和归属也在分析当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参见 Stallings and Kaufman 1989; Haggard and Kaufman 1992, 1995; Bates and Krueger 1993; Haggard and Webb 1994)。尽管有一些建立理论的努力(例如, Frieden 1989),但弗里登【3】(Frieden)的这篇文献,就像是论述民主化的那篇文献一样,主要还是在描述,而且其关注的焦点仍是不同案例中决策的细节。简而言之,研究民主化与经济改革——在过去的四分之一世纪中这是发展中世界里最引人注目的两个话题——的学者,发现了旧有理论的不足。

这个问题并不是由在我们控制之外的自然行为或是人类行为所引起的。本书的出发点就是,当我们忽略了研究设计的基本问题时,我们已经决定了我们自己的命运。为了取得成功,社会科学必须在斯库拉(Scylla)巨岩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漩涡之间的航道上小心翼翼地前行,巨岩这边是可爱的但却未经检验的理论,漩涡那边则是未经理论组织的信息^①。比较政治学领域中的大部分研究都没能坚持这一困难的路线,而是相反,从一个灾难性的极端猛地跳到另一个极端^⑤。其结果就是在该领域的很多分支之中,理论知识积累缓慢。观点、理论甚至范式倾向于在快速的更迭中兴旺衰败,几乎没有留下什么东西表明它们曾经存在过。就像精心搭建沙堡一样,人们已经以巨大的努力和对理论细节的关注而建立起了范式,但这些范式最后却只是被下一代研究生的浪潮冲走,他们的研究不断地冲击现存范式的弱点——他们理应如此——直到这些理论大厦崩溃消失。

每一个当前的新事件都需要从头开始研究,这不能归因于比较政治学家理论想象的失败。相反,这不是因为我们周期性地抛弃这些旧理论,而是因为我们没有能力利用、发展并扩展这些理论。这并不是说我们滥用理论,或者说对我们的理论不忠。就像其他的学者对待他们自己的理论一样,我们以同样的热情和韧性坚持我们的理论。问题在于,我们的理论——那些未经与事实进行系统性验证而谱出的“塞壬之歌”^⑥——最终使我们的梦想破灭。残酷且令人不适的事实,常常在创立理论的时候是可得,但我们却没有使用这些事实,而这些事实终将引起我们的注意,并迫使我们放弃自己的理论。【4】

① 斯库拉(Scylla)与卡律布狄斯(Charybdis)是古希腊神话中的两个妖怪。斯库拉是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守护着墨西拿海峡;卡律布狄斯是漩涡怪,每日吞吐海水形成漩涡,将过往船只吞没。而现实中的斯库拉是位于墨西拿海峡一侧一块危险的巨岩,它的对面即是卡律布狄斯大漩涡。——译者注

⑤ 针对这一批评,有很多明显的例外情况,这当中包括大部分对西欧民主政体的研究。尽管如此,这一批评仍适用于该领域的大部分内容,尤其是研究“大”问题的那一部分:如民主化、发展、经济政策改革和革命。

⑥ 原文为 siren songs,直译为“塞壬之歌”。塞壬(siren)三姐妹是古希腊神话中的海妖,她们用自己的歌喉使过往的水手倾听失神,航船触礁沉没。——译者注